



她们，
用温柔改变了世界
日本女性の静かな革命

日本女人， 温柔的革命

【法】高丽安 著
佟心平、徐艳 译

在“女性颠覆”逐渐成为主流的当下，
日本女人却始终乐于进行完全女性化的表达，
并用温柔的方式，
正主导了日本社会的变革。

日本女人， 温柔的革命

【法】高丽安 著
佟心平、徐艳 译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女人, 温柔的革命 / (法) 高丽安著; 佟心平, 徐艳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87-3690-8

I. ①日… II. ①高… ②佟… ③徐… III. ①女性—研究—日本 IV. ①D731.38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3715号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7-2011-3199号

© 1998, 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王默涵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日本女人, 温柔的革命

(法) 高丽安 著 佟心平、徐艳 译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635毫米×965毫米 1/16 字数/205千字 印张/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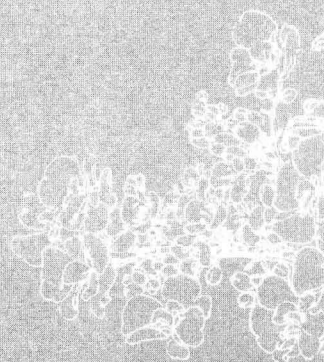
版次/2011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谨向在该书创作过程中所有给我支持与帮助的人表示感谢，首先是我的丈夫于贝尔·泰斯塔和照料孩子们的维奥来塔·比埃纳旺蒂阿。

此外，还要感谢科里娜·昆廷、皮埃尔·安托万·多内、埃弗琳·犬塚（Evelyne Inuzuka）、渡边雅子（Watanabe Masako）、中谷尚子（Nakatani Naoko）、郡嶋英子（Gunjima Eiko）、关泽英彦（Sekizawa Hidehiko）、土屋（Tsuchiya）女士、小原信玄（Ohara Shingen）、富泽智头（Tomizawa Chizu）及所有乐于拨冗相见的人。

（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尊重，本书中大部分人名都作了改动。根据传统，本书中日本人的姓名按日本方式将姓置于名前。）



写给中国读者的话

认识Asuza时，我刚到北京几个月。她那时已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日，她邀我去雍和宫附近的一家小茶馆品茗。时值隆冬，我们的房间阴暗幽静，朝屋外望去，能看见光秃秃的树丫和雍和宫的红墙。同是异乡人的我们用日文聊起各自的感受。Asuza对我说，她在中国这里朋友颇多，且许多都属于爱热闹喜欢玩乐的城市新新人类。不过，她还是打算回日本结婚生子。年过三十的她不想错过组建家庭、规划人生的关键时刻……当时，我刚开始学习普通话，识字不多，得搜肠刮肚地才能表达意思，用日文与她自由地交谈真是非常惬意！在她优雅的言谈举止中，在她并不直视而是以讲究分寸的触碰靠近我视线的方式中，我发现了一种我所熟悉的、超越言辞的、完全女性的交流艺术。一旁，年轻的服务小姐正在用专门为游客准备的介绍给我们讲解中式茶艺，她一定觉得我们的谈话高深莫测吧。看着两个外国女人，一个亚洲人，一个高加索人，在一起用日语聊天，这一定让她觉得有些奇怪、迷惑。通过这次以及其他与在中国定居的日本女士的会面，我愈加相信，中国对日本女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似乎在中国的日子使她们找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

界：处处是既熟识又令人迷乱的标志，有点似梦境成真，又似诱惑实现。再来看看日本对中国女人的影响吧。我一个最好的朋友，祖籍南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对所有可能来自日本的东西一直持敌视态度。但在跟随先生去了一次日本后，她便来找我，向我倾诉了日本古都之美对她的种种吸引之处。此外，我也记得其他类似的场景：两个二十五岁的中国女大学生激动地表达着各自对日本人的看法。一个是在日本北部的仙台市享受奖学金的学生，另一个则从来没去过那个被她视为“侵略者”的国家。尽管平日关系亲密，两人此时却语调激动地相互指责，一个认为对方对日本过于宽容，另一个则认为对方缺乏开放精神。

当时，我用中立的面孔乔装自己，内心却充满挣扎。一方面，我要深藏起自己对日本的喜爱，以免引起因日本而遭受家庭劫难的中国朋友的不快；另一方面，我却渴望表达对日本的生活艺术和美学的深爱。并且，随着我对中国认识的不断深入，我还得以衡量日本艺术和美学渊源于中国的程度。我也体味到，日本，这个文化博物馆，她晓得如何重新润色传统，一个中国正在回归的传统。

作为在中日两国都生活过的法国女作家（我曾在日本居住过八年，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年），我不仅有充裕的时间在两国妇女之间建立真正的友谊，而且，我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两国的社会现实、历史和集体心理特征。我对日本虽然更为了解，但是，中国与中国人也正令我愈来愈感到亲切。许多共同之处不断跃入我的眼帘。在远离欧式超级市场和商业街，远离美国商业中心的地下，藏着完全按照日式风格装修的商品一条街；海报上到处都是宣传奥运的外形圆润的小人儿，似乎是受了卡哇伊风格的影响；我还发现，中国的孩子们特别喜爱从中国台湾过来的日本的时尚玩意儿、流行乐、动画片或连环画。

不过，我很快就为存在的差异而吃惊。中日两国间的确曾经相互影响过，包括20世纪初的中国人。不过，现在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写这篇前言时，我刚完成一本名为《中国女人，踮踮前行》的书。而您刚刚翻开的这本书，叫作《日本女人，温柔的革命》。两种形象即展现出了差异。在中国，当毛泽东赋予了妇女选择配偶及离婚的权利，规定妇女在政治岗位的席位比例，努力消除卖淫、同居现象时，妇女解放运动便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而在日本，美国人以源自西方的民主价值为基础给日本制定了新的宪法，那种在中国的新儒家思想启迪下建立起的日本家庭规范，在军事失败面前走向了终结。妇女们一点一点地争取到了自由空间，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迫于社会体系的压力，她们注定要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得不重新回归家庭。在飞速发展的中国，一方面，尽管妇女失业比例有所上升，但所有的城市妇女都拥有过工作经历，女企业家们可以在那里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政府实施了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客观上降低了女孩的出生率，同居、卖淫现象也再次出现。

能够体现中日差别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想，今天最重要的应是认识到，亚洲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她不应该只谋求与欧洲竞争或寻求回击，而应将目光转向亚洲的近邻，寻求在相近的文化背景与悠久的历史交往的基础上，开展丰富的交流。比如说日本女性学研究学者、家庭问题专家落合惠美子，她曾长期致力于日本与西方的分析比较工作。近几年，她顺应历史潮流，致力于研究亚洲现代家庭的不同发展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几年前，我和我的三个孩子一起游览了雅典帕特农神庙。我想带他们看一看我们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那里，我遇见了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的游客。我很想知道，在亚洲游客的

眼中，这座代表了民主思想的摇篮——雅典文化的神庙到底有着何种意义。二十多年来，在东北亚各种文化的熏陶下，我自己也受到了这个地区传统观念和世界观的影响及塑造。即便如此，它们对我来说仍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物，我仍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去识别它们，直到在某一时刻，我可以将它们的某个层面、某种行为融化在我的身体里。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水墨画吧，我现在正沉浸其中，希望在其中寻找宁静，让我回归自然。

我深信，正是通过交流、对话与善意的了解，我们才能不断地去认识一种文化。如果我的书能够为加深中日相互了解、改善和推进两国关系尽到绵薄之力，我将感到万分荣幸。

高丽安

2008年3月27日于北京

前 言

在一个羁绊相对较多的社会体系中，尽管女性显得较不畏首畏尾，但她们果真能带来国家的复兴吗？答案是复杂的。日本所经历的危机远未结束。危机亦是柄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推翻某些游戏规则，它鼓励价值的演变，促生了更为广阔的开放性与社会多元性，从而有利于敢闯敢干的女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一种阻碍。事实上，危机限制了经济上获得发展的可能，触发了退缩与恐惧的反射。由于女性武装得较不完备，危机对其就业的损害往往更为严重。

当然，日本女性仍然继续受益于国家的逐步开放及生活方式与价值的多元化发展。某些个人主义形式的崛起（如由其引发的单身男女数量爆炸式的增长、离婚率的上升、出生率的下降等），国家的缓慢国际化，承认创造性的不可逾越，都促成了某些障碍的消除。那些最勇于进取的日本女性在新经济与妇女网络发展中所占有的地位正可说明这一切。

同样，女性也受益于与青年一代男性之间的默契。她们在展示其“女性特性”时相对而言更不犹豫。日本的传统与语言所强调的性别差距在年轻人中已被缩减，所有的社会学分析都表明这一点。新一代年轻男性在面对传统的男性形象时感觉并不自在，

这一形象在失业的切削下正逐步解体。子辈们越来越不赞同父辈们提前确定的生活模式：毕业后即进入一家尽可能大且稳定的企业，寻找一份理论上的终身职业，代价则是牺牲掉个人时间与私生活。这种模式所鼓吹的深刻的角色分化越来越从其肿胀的边缘被大量蚕食。

此外，在法律层面上，一些长久以来的呼声近两年得到了落实。1986年关于就业方面两性平等的法律修正案在1999年4月开始生效。新条文取消了对妇女上夜班及加班时间的限制，取消了招工时对专属于男、女岗位的区分。从长远上看，在当前劳动力资源短缺已逐渐显露的背景下，这些措施必将有利于两性之间更为平等地就业。

在避孕领域，日本女性在1999年终于获得了购买避孕药的权利（但费用仍不给报销），比美国晚了整整40年。但仍须强调的是，该许可只是在“伟哥”被批准上市之后才得到的，“伟哥”的批准仅用了不到6个月时间，创下了纪录。

最后，在打击性骚扰方面，大阪（Osaka）市市长（兼所处县知事）因在竞选期间对其年轻女下属实施骚扰而被迫辞职，并被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这一宣判向在日本企业中泛滥的针对女性的放肆举止发出了警告。此外，一名女士被选举出来填补该职位，从而成为第一名女性县知事。

从普遍意义上讲，20世纪90年代的10年确定了妇女的消费地位，她们成为新趋向的领导者，消费运动的鼓动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女性在生活方式及生活渴望上一直都领先于男性十几年，她们更为崇尚享乐，更为关注自己，对外部世界更为开放，甘冒风险来创立一些小的企业。但是，今天她们却被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更为年轻的男性以及出生于生育高峰时代的男性所赶上——前者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表现出更多的个人主义意识；后者则在退休之前偏离了工作的价值取向，希望利用

积攒下来的金钱，使自己享受这一段时光。

女性在环保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也是领导者。她们组织起许多大型的社会团体，为健康的食物，为销毁垃圾而奋斗。同时，她们在家庭预算中掌管的开支份额也日益增长。根据博报堂（Hakuhodo）研究中心的估计，女性约掌管着家庭当中70%~80%的开支份额。女性在传统上始终掌管着家庭的钱袋，但随着她们个人购买力的增长，该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她们能够决定购买的商品种类也扩大到大型商品、住房与家庭理财的范畴之中。在新技术领域，她们人数众多，在日本网民中占有重要比例。她们绝大多数为中年妇女，拥有文凭与自由时间（在日本，拥有文凭而不工作的女性比例非常之高）。她们利用网络来发展新形式的横向联系。

但女性同时也是失业与危机所带来的就业不稳定的牺牲品。尽管法律就性别平等作出了修订，但歧视并未因此而消除。职业女性仍不多，绝大部分女性仍窘困笼中，且她们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日本女性在劳动力人口中占41%，但只有不到10%的人占据着领导岗位。如何调和全日制工作与有儿童和年迈父母要照顾的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一个女性要面对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了临时工作或非全日制工作，从而为企业提供了灵活的、廉价的劳动力。

1986年法律通过后，一些企业作出了努力，以便为女性开辟出更为广阔的体面就业途径^[1]；但作为回应，许多企业都要求女职工长时间地工作，随时接受各种考验，并去做一些通常应由低级女职员来完成的工作。结果很明显，在那些希望事业有成的女

[1] 为了抵消1986年法律的影响，大部分大型企业都作出了高尚部门和普通部门的区分，除极个别情况外，大部分女性都处在普通部门中，没有成就事业的前景。原文注。

性当中，绝大部分都在职业要求与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必要性之间左右为难，并且不得不作出选择：或者放弃职业生涯，或者推迟甚至是放弃婚姻和生孩子。无论是在大学毕业的女性就业方面^[1]，还是在家务劳动的分担方面，日本都亮起了红灯，排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后面^[2]。

此外，经济危机又再次否定了20世纪80年代末所取得的进展。在20世纪90年代初，80%的女大学毕业生刚一走出校门便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而到了90年代末，她们已经成为削减年轻毕业生数量的第一批牺牲品。至于传统上留给她们毫无事业前景的写字楼工作，其数量也已逐步递减，或者是因为一些老资历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结婚时辞掉职务，或者是因为企业取消了这些低级职务或是将其转包出去。

最终，在就业领域中，大量女性选择了快速发展的不稳定工作。今天，她们已经占据了非全日制劳动者的60%，以及临时雇员的70%。她们之中大约有一千多万人（约占女性从业者整体的40%，所有从业者整体的20%）从事着被称为“非全日制”的工作。实际上，这些工作通常都很稳定，但不能使她们拥有签署劳动合同的权利，给她们提供的报酬也明显低于所谓“全日制”的工作。然而，在经济重压下，或是为了调节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的平衡，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这种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末，非全日制工作占据了日本就业市场1/5强的份额。

最后，在政治领域中，女性的地位有了些许好转。1999年，众议院中女性比例占到了9.1%，而在1986年却只有3.6%；在地方议

[1] 在美国、法国和德国，80%的大学毕业女性可以找到工作；而到了日本，则只有60%的大学毕业女性可以找到工作。不过，在日本，较低教育层次的女性工作人数却要比其他国家的多。原文注。

[2] 据统计，1996年，在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中，丈夫平均每天花费7分钟从事家务劳动，而妻子则为3小时35分钟。原文注。

会中的数字则分别为4.9%和1.6%。但不平等仍是显而易见的。今天，与其说障碍是在法律层面上，不如说是在社会层面上。因为这些障碍源自于在一个以男人的默契为基础的经济政治世界中对社会关系的玩弄，源自于在一个与民主透明原则背道而驰的选举体系中对秘密与幕后操纵的喜好。2000年春天，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因脑梗死突然死亡，对其继承人的指定正为此提供了明证。

引言

1998年春天，电话里传来两条自相矛盾的消息。在日本危机的紧要关头，佐佐波杨子（Sazanami Yoko），一名65岁的大学女教授被选举为负责向不良银行体系注入新鲜公共资金的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日兴证券（Nikko Securities）公司正在通过一家子公司试图解雇1500名雇员，全部为女性，她们约占其雇员总量的1/5，女雇员总量的一半。

一方面是妇女参与决策的显著信号，另一方面则清楚地揭示出与经济危机的背景相关联的退步。

那么，究竟是日本被女性拯救，还是女性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首批牺牲品？是否还应该相信日本第一大经济日报《日本经济新闻》所鼓吹的由女性所主导的“静静的革命”，宣称女性正在一个带有欺骗性的、僵化的日本内部引发一场社会地震？是否还应该相信那些民意调查机构所公布的，声称女性在近十多年始终在新潮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调查结果？是否还应该去听一听街头的闲言碎语，听一听对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身上张狂的个人主义的赞赏或批判？

或者是否应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对女性就业的“冰冻期”——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感到悲哀？我们应该关注到——

就如同1997年首相府有关部门发表的《性别平等白皮书》所陈述的那样——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仍然不能给予女性同男性公平竞争的可能性，女性参与决策的途径仍大受限制。

现实是有细微差别的。为了衡量日本女性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经历的变化，我做了18个月的调查，通过非指导性的，延续几个小时的日语交谈，收集了一百多位女士、男士（115名女士、12名男士）的证言。

为建立起我的样本，也出于我对变化的兴趣，我尤其关注那些尝试着过一种更接近其个人渴望的生活的男性或女性。我再将这些证言同我在这些变化的代表性场地——幼儿园、女性诊所、夏威夷的酒店、女子大学、大型企业集团的人事部门、娱乐俱乐部等所作的系统调查相比较。并且，为了抵消东京的影响，也为了作出更好的评判，我还在北海道（Hokkaido）的郊区社区度过了许多天，走访了十几个中产阶级家庭。

这些对生活的描述被夹叙在由专家（社会学家、作家、心理分析学家）点评的调查中。我并不奢望我的调查样本具有科学效用。确切地说，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的工作，我并不寻求去论证什么，而只是想让人们去看、去感受、去思考。

调查的挑战之一是如何衡量媒体对女性解放的论断与绝大多数日本女性的真实生活。调查中，我始终注意超越事物的本身来理解其阻滞或是跃进的缘由。我尽力去抓住每个人的个体敏感性与其社会代表性的框架。我希望能够理解给予其生活意义和理由的东西。因而在对话中，我能够更好地确定出那种使我们更为人性化、使我们能够超越文化与社会差异的东西，确定出各种文化究竟是怎样孕育出不同的束缚、局限与烦恼。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的外国女性身份对我搜集到大量的素材发挥了作用。在某些时刻，人们可以更为容易地对我说出知心

话，因为我只是一名路过的外国女士，我有权，或者说我可以无知地去问一些天真的、并不审慎的问题。

很快，在我的调查中显现出四个大的趋向，女性在其中占据着先锋位置。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些趋向包括个人主义（但究竟是哪一种呢）、享乐主义、国际化以及创造性的崛起。这些趋向并不仅仅局限在日本，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都是如此。菲斯·鲍普康恩（Faith Popcorn）在《走向成功》（Clicking）^[1]一书中谈到“女性思维”，《法国透视》（Francoscopie）^[2]编辑团队也谈及法国“价值的女性化”。但是在我看来，在一个儒家传统的国度里，这些趋向有着特殊意义。

为了将这些新的趋向定位在一个更为普遍与系统的框架内，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叙述了妇女地位的演化所直接产生影响的各个领域，包括工作、权力、子女、婚姻及男性与女性关系。

在进入我的主题之前，我想解释一下本书标题——《日本女人，温柔的革命》。

为什么说是“革命”？因为对日本女性而言，事情在一代时间里发生了巨变。我的所有对话者，当她们将自己目前的情境与她们母亲的情境相比较后，都承认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将莱博若（Takie Sugiyama Lebra）女士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作的杰出调查^[3]作为参照的话，今天的女性要比30年前的女性拥有多得多的生

[1] 参见菲斯·鲍普康恩与马里戈德（Marigold）的《走向成功》，哈珀（Harper）商务出版社出版，1997年。

菲斯·鲍普康恩是全球首要的市场营销和趋势研究公司之一BrainReserve 的创始人兼总裁，在其一本新著《走向成功》中，她列出了在未来10~20年中将会对企业产生影响的十大趋势。译者注。

[2] 参见杰拉尔·梅尔美（Gérard Mermet）的《法国透视》，拉鲁斯出版社出版，1995年。原文注。

[3] 参见莱博若的《日本女性，束缚与完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4年。原文注。

活选择与机遇。Okusan女士^[1]变成了Sotosan女士^[2]；日本女性走出了家庭的深处；原子型家庭^[3]取代了传统的大家庭，甚至还在最近几年让位于孤独的个人，使其成为社会构成的基础单位，这一点正如同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Ochiai Emiko）所指出的那样^[4]。在就业领域，一部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被通过，即便仍然存在许多瓶颈，尤其是在等级的高层。

日本女性通过她们的肚子、信用卡、护照进行着革命。她们消费，健身，自我陶冶，旅游或移民国外。她们将头发染成红褐色，戴着蓝色的隐形眼镜。她们更晚结婚，更多离婚，生更少的孩子，偏爱要女儿。她们夺走文学大奖，成立摇滚乐队，拍摄电影，设计低租金住房。她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咬紧牙关，或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或为自己打工，或在大型企业中任职，因为她们仍然继续承担着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当然，她们也有不能容忍的时候，最终选择了离婚，即便已经很晚。

在今天的日本，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个人主义形式的崛起。大型企业越来越不能保障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终身职业。强迫迈向个人主义的这一步并非没有遭遇过阻挡，也并非没有造成破坏，但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与日本男性相比，日本女性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来批判日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模式（集体主义、儒家思想）。作为长期以来这一儒家体系的牺牲品，她们失去的

[1] Okusan：内人，字面含义为“人妻”，指在二战后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待在家中的妇女。

[2] Sotosan：20世纪80年代由一本女性杂志所创造的新词，以表明女性与公共领域的割裂。原文注。

[3] 社会学名词。即仅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家庭单位。编者注。

[4] 参见落合惠美子的《过渡中的日本家庭体系》，日本长期信用银行（LTCB）国际图书基金公司出版，1997年。从严谨的人口统计学出发，落合惠美子指出，原子型家庭在日本真正的普及只有1955年到1975年的20年时间。它宣布传统大家庭形式的消失（其在每户少于两个子女的情况下很难继续存在）以及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新型家庭形式的到来——个体根据不同的情况互相选择或分离，从而创造出多种家庭模式。原文注。